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306_20(1).0003

「普羅詩」在臺灣（1927-1932）[§]

Proletariat Poetry in Taiwan (1927–1932)

張詩勤*

Shih-Chin CHANG

關鍵詞：中野重治、藤原泉三郎、上清哉、徐淵琛、徐瓊二

Keywords: Nakano Shigeharu, Fujiwara Sensaburou, Kami Seiya, Hsu Yuan-chen, Hsu Chiung-erh

2022年3月6日收稿，2022年10月8日修訂完成，2023年4月7日通過刊登。

§ 本章部分內容曾以〈台灣におけるプロレタリア詩の萌芽——雜誌『無軌道時代』を中心に〉為題發表於「日本台湾学会第22回學術大會」（東京：早稻田大學／書面討論，2020年5月30-31日），獲得評論人吳歡人老師珍貴意見，特此致謝。本刊審查期間，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改意見與指正，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摘要

本文考察日治時期臺灣詩壇如何透過不同的文藝雜誌接受日本的「普羅詩」（プロレタリア詩）以及中國的「普羅詩派」，並且從「在臺灣」書寫普羅詩開始，進而發展到書寫「臺灣的」普羅詩的過程。

本文將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說明 1927-1930 年臺灣對於日本的「普羅詩」與中國的「普羅詩派」的接受。研究材料為日文的《無軌道時代》與中文的《洪水報》、《赤道》等。第二部分則探討上述階段普羅詩尚未能反映殖民地現實之面向。說明 1931-1932 年在普羅詩衰退之際，新的文藝社群與新的普羅詩創作方向如何突破上述階段的困境。研究材料為中日文的《臺灣文學》（1931 年創刊）等。1930 年代，雖然當局對於左翼運動的鎮壓使極左路線的運動與作品失去繼續發展的空間，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普羅詩的精神及其對於階級關係的思考、對殖民地臺灣特殊性的重視逐漸成為臺灣左翼詩人的共識。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aiwanese modern poetry circles accepted the concept of the proletariat poetry of Japan (プロレタリア詩) and China (普羅詩派) through different literary magazin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also probes how the poets at this time started writing proletariat poetry “in Taiwan” and then developed into writing “Taiwan’s” proletariat poetr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 the acceptance of the proletariat poetry of Japan and China in Taiwan during 1927–1930 is described based on discussion of three magazines: the Japanese *Era Without Tracks* and the Chinese *Flood News* and *Equator*.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sconnection of these proletariat poems from the colonial reality and explains how, in 1931–1932, a new literary community and new creative direction broke through this dilemma of proletariat poetry in Taiwan. The research material examined comes from *Taiwan Literature*, a literary magazine founded in 1931 in both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languages. In the 1930s, the authorities’ oppression of the left-wing movement left little scop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ultra-left movement and its literary and poetical works. However, the spirit of proletariat poetry, its thinking on class relations, and its emphasis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colonial Taiwan gradually became a consensus among Taiwanese left-wing poets.

壹、前言：何謂「普羅詩」

一如「內地」日本、「祖國」中國乃至世界詩壇，「普羅詩」也曾經短暫風行於日治時期的臺灣詩壇。不同於臺灣文學史中常見的「左翼文學」「左翼詩學」等描述，「普羅詩」作為普羅文學運動的一環，具有相對嚴格的定義與相對限定的時代背景。然而，過去由於時代與政治環境的限制、前行研究對於小說的偏重或者史料的缺乏等因素，日治臺灣「普羅詩」的論述尚未被建構。本文將考察日治時期的臺灣詩壇如何透過不同的文藝社群接受日本的「普羅詩」（プロレタリア詩）以及中國的「普羅詩派」，並且從「在臺灣」書寫普羅詩開始，進而發展到書寫「臺灣的」普羅詩的過程。

在日本與中國，對於「普羅詩」有其各自的定義及時間範疇。日本的「普羅詩」，是指「立足於馬克思主義，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所創作的革命詩」，¹時間範圍約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二年間。²另一方面，中國的「普羅詩派」或稱「普羅派」，則指「理論多由日本和俄國引進，他們認為文學是勞動界鬥爭的武器，提倡寫實主義，要以普羅階級前衛者的眼光觀察世界，用嚴正的寫實者態度從事創作」，³流行時間較日本短，約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間。⁴上面的定義和時間範圍在各家論述當中或有不同，但可以確認的是「普羅詩」不論在日本或中國，都是以無產階級運動作為主導，並在約一九二〇年代末、三〇年代初之間達到其創作與論述的高潮。

觀察普羅詩開始走向高潮的時期，可以看到日本與中國的左翼運動者皆在政治面中經歷挫敗，遂在文化面上愈發活躍。一九二七年的日本，在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爭論不休之際，共產國際制定二七綱領，左翼文藝團體自此分裂為三（山川派、福本派、二七綱領派），而一九二八年的三一

1 佐藤健一：〈プロレタリア詩〉，安藤元雄、大岡信、中村稔監修：《現代詩大事典》（東京：三省堂，2008年2月），頁585。

2 同前註，指從《勞動詩集・在底層歌唱》（労働詩集・どんぞこで歌ふ）出版的1920年，到克普大鎮壓中大多數的詩人遭到逮捕的1932年。

3 舒蘭：〈柒、普羅派和民族派時期〉，《中國新詩史話（二）》（臺北：渤海堂文化，1998年10月），頁1。

4 柯文溥：〈論“普羅詩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2期（1990年2月），頁48。

五大檢舉使得組織間朝向共同對抗政治權力的統一合作，遂有了支持日本共產黨的「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納普）」的成立。⁵另一方面，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國民黨在北伐期間進行「清共」，受到政治迫害的左派知識份子，在一九二八年由創造社和太陽社兩個文學團體開始鼓吹共產革命文學，直到一九三〇年集結成「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是實際由中國共產黨所掌握的文藝組織。⁶此時，受到政治打壓而遭遇挫折的中日左翼運動者向外移動，逐漸形成東亞「左翼文化走廊」。在「東京↔上海」為主要幹道的文化走廊之上，「東京↔臺北」「上海↔臺北」的支線也將包括普羅詩在內的左翼文化養分帶入了臺灣。⁷

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的臺灣文化界和日本、中國一樣，受到左傾思想的強力席捲。一九二七年，臺灣文化協會分裂，文協讓渡給共產主義派，蔣渭水和林獻堂等人另組臺灣民眾黨；一九二八年，臺灣共產黨正式成立，新文協遂實質化歸為臺共的指導之下。⁸然而，臺灣的普羅詩創作在此時並沒有大量出現並蓬勃發展。在日本或者中國，由共產主義主導的文藝組織所發行的刊物，如納普的《戰旗》、後期創造社的《創造月刊》或太陽社的《太陽月刊》都刊登大量的普羅詩創作，但是新文協發行的《臺灣大眾時報》並非文藝雜誌、臺灣民眾黨主導的《臺灣民報》的階級色彩則不鮮明。究其原因，殖民地臺灣的言論檢閱與管控較中日更為嚴格，普羅運動相關的論述與創作經常尚未面世並告夭折，從《臺灣出版警察報》中多次

5 飛鳥井雅道：〈第二章 一九二七・八年的情況〉，《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史論》（東京：八木書店，1982年11月），頁111-115。

6 皮述民、邱燮友、馬森、楊昌年：《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駱駝出版社，1997年8月），頁125-126。

7 「左翼文化走廊」的概念為柳書琴所提出。詳參：柳書琴：〈左翼文化走廊與不轉向敘事：臺灣日語作家吳坤煌的詩歌與戲劇游擊〉，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年12月），頁163-200。在柳的論述當中，「東京↔上海」的走廊是在兩國的左翼運動從高峰下墜的1930-1931年形成。然而，從本文提出的普羅詩在臺灣的接受來觀察，左翼文化走廊的形成至少可以再往前推至1929-1930年。

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一冊・文化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中譯版〕》（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6月），頁332-333。

查禁《戰旗》的紀錄便可窺見一斑。⁹根據筆者的調查，臺灣的普羅詩是在一些期數不多、相對無名且小眾、且被當局一再查禁的同人雜誌中誕生的。而若要追索普羅詩在臺灣的軌跡，必須將兩批雜誌並列觀察，方能看到相對完整的普羅詩面貌：一是繼承日本「普羅詩」的《無軌道時代》雜誌，二是移植中國「普羅詩派」的《洪水報》、《赤道》等雜誌。本文將以上述中日普羅雜誌為中心來探討普羅詩在臺灣的誕生與侷限。

需要說明的是，在中日普羅詩移入之前，自一九二〇年代開始，《臺灣民報》上的中文新詩已形成臺灣自身的左翼詩傳統。最早且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應為賴和一九二五年為二林事件所作〈覺悟的犧牲〉，¹⁰然而該詩作比起階級意識，民族意識是更為優先。一九三〇年代以後，則有《臺灣新民報》上的楊守愚、《臺灣文藝》上的楊華為勞動者所寫的左翼詩。楊守愚與楊華的詩確實已具有階級意識，前行研究也累積不少成果。本文不從上述為人熟知的史料著手，而以與日本普羅詩和中國普羅詩派有所連結的《無軌道時代》、《洪水報》、《赤道》等雜誌切入，主要欲呈現一九二〇年代末期至一九三〇年代初期臺灣在東亞的「左翼文化走廊」當中接受外來普羅詩思潮的具體情形，並且參照中日普羅詩的既有概念，將普羅詩定義與範圍限縮至具有鮮明的階級意識、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的詩作。

本文將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二～四節，說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臺灣對於日本的「普羅詩」與中國的「普羅詩派」的接受。第二部分是第五～六節，將探討上述普羅詩未能反映殖民地現實之處，以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在普羅詩衰退之際，新的文藝社群與新的普羅詩創作方向如何突破上述普羅詩的困境，不只是「在臺灣」書寫普羅詩，而是真正開始嘗試書寫「臺灣的」普羅詩。

9 目前可知曾經查禁過《戰旗》1929年10月號（《台灣出版警察報》第六號（1930年1月），頁38-39）、1930年2月號（《台灣出版警察報》第八號（1930年3月，頁157）、1930年6月號（《台灣出版警察報》第十一號（1930年7月，頁27-28）、1931年9月號（《台灣出版警察報》第二八號（1931年11月，頁459）。參見復刻版《台灣出版警察報》（全六冊）（東京：不二出版，2001年2月）。

10 賴和：〈覺悟的犧牲〉，《臺灣民報》第84號（1925年12月20日）。

貳、中野重治的追隨者：藤原泉三郎與上清哉

在臺灣最初的普羅文學雜誌《無軌道時代》於一九二九年創刊之前，其創刊者藤原泉三郎、上清哉曾經歷過巨大的思想轉換。本節將論述的即是這段使他們與日本普羅詩接軌的過程。

日本普羅詩作為普羅文學運動的一環，其起始一般認為是一九二〇年根岸正吉、伊藤公敬的《勞動詩集・在底層歌唱》（労働詩集・どんぞこで歌ふ）的出版以及隔年《播種者》（種蒔き人）雜誌的創刊。而一九二四年《文藝戰線》的創刊與隔年「日本普羅文藝聯盟」的創立則說明集團性階級運動的開始。一九二六年，在《驢馬》雜誌發表的中野重治的普羅抒情詩與詩論，以及在《文藝戰線》發表的青野季吉〈自然生長與目的意識〉（自然生長と目的意識）標誌著普羅詩的新階段。¹¹一九二七年，日本普羅藝術組織在山川主義與福本主義等政治與藝術運動的爭議、以及共產國際的二七綱領的發布中分裂為三：「普羅藝術聯盟」（簡稱普羅藝，機關雜誌《普羅藝術》）、「勞農藝術家聯盟」（簡稱勞藝，機關雜誌《文藝戰線》）和「前衛藝術家同盟」（簡稱前藝，機關雜誌《前衛》）。¹²一九二八年，以三一五大檢舉為契機，「勞藝」和「前藝」合併成「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簡稱納普，機關雜誌《戰旗》）。此組織結合了文學、戲劇、美術等藝術領域，成為日本普羅藝術運動的統一集結，迎來了所謂的「納普時代」。¹³

在日本普羅文學運動如此分裂與結合的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中野重治的位置。栗原幸夫整理了「勞藝」的中野重治和「前藝」的藏原惟人之間的論爭，認為在藝術方面來說，中野重治與藏原惟人之間最主要的對立在於：中野將藝術理解為「感情的組織化」，而藏原則是將藝術作為「將感情與思想社會化的手段」。¹⁴栗原幸夫指出中野重治的這種浪漫主義是直

11 佐藤健一：〈プロレタリア詩〉，安藤元雄、大岡信、中村稔監修：《現代詩大事典》（東京：三省堂，2008年2月），頁585。

12 栗原幸夫：《增補新版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その時代》（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04年1月），頁45-46。

13 栗原幸夫：《增補新版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その時代》，頁48-49。

14 栗原幸夫：《增補新版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その時代》，頁49。

接繼承了從北村透谷、國木田獨步、石川啄木到芥川龍之介、萩原朔太郎等日本近代文學的苦戰惡鬥，感性且深遠地與日本的現實相結合，反而藏原惟人的現實主義是觀念上的世界主義。¹⁵然而，中野重治所主張的「對於微小事物的關心」、「對於被污辱的正義而憤怒的共感」如此抒情的、個性化的，或者說是「文學的」主張，在運動中是無法抵擋以黨的政治理念所主導的藏原惟人的主張。故日本普羅文學運動實際上是朝著藏原惟人所主張的方向前進。¹⁶

從日本近現代詩史來看，中野重治的位置也是如此與抒情性緊緊相連。如澤正宏指出中野重治是「將普羅詩理念放在至今為止的抒情詩系譜的位置上」，¹⁷三浦建治也提到「中野有著從室生犀星學得的抒情的根源，藉由踏入社會主義運動，演奏出抒情與政治決心的獨自的交響樂」。¹⁸正是如此的抒情性，將原本與無產階級運動與普羅文學運動無關的藤原泉三郎、上清哉這兩位殖民地日本青年帶入了普羅詩的世界。

藤原泉三郎、上清哉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初就活躍於臺灣的日文近代詩壇。¹⁹他們在臺北先後創辦了《亞熱帶》、《炎天》、《Jasmine》、《白色燈塔》等詩歌雜誌。兩人自承學生時代著迷於國木田獨步、島崎藤村的詩作，畢業之後轉為傾慕「感情詩派」的萩原朔太郎與室生犀星的詩，直

15 栗原幸夫：《增補新版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その時代》，頁49。

16 栗原幸夫：《增補新版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その時代》，頁64。

17 澤正宏：〈第三章 プロレタリア詩 概観〉，澤正宏、和田博文編：《作品で読む現代詩史》（京都：白地社，1993年3月），頁74。

18 三浦建治：〈明治・大正・昭和詩史（8）プロレタリア詩とは何か（3）〉，《詩人会議》第668期（2018年5月），頁73。

19 關於兩人的生平概要，參閱以下河原功、中島利郎、橫路啟子的文章。河原功：〈陳忠少年的話 解題〉，藤原泉三郎：《陳忠少年的話》（東京：ゆまに書房，2001年9月），頁1-7；河原功：〈上忠司と黒木謳子〉，河原功編：《台灣詩集》（東京：綠蔭書房，2003年4月），頁599-612；中島利郎：「上清哉」、「藤原泉三郎」辭條，《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学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年6月），頁13、92；橫路啟子：〈藤原泉三郎とその台灣時代--文学活動を中心に〉，《天理臺灣學報》20期（2011年7月），頁27-40；橫路啟子：〈在台內地人のプロレタリア文学：1920年代末の藤原泉三郎の諸作品を中心に〉，《天理臺灣學報》21期（2012年6月），頁13-24；橫路啟子：〈論臺灣地區日本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的共同體意識變化問題——以藤原泉三郎為中心〉，《東北亞外語研究號》2卷3期（2015年6月），頁34-40。

到一九二七年，兩人方透過《驢馬》雜誌的中野重治的詩與詩論真正找到文學方向。²⁰雖然同一時間，臺灣人知識份子在島內農民運動的崛起與國際社會主義的思潮中左傾、臺灣文化協會亦在連溫卿取得主導權後正式分裂，但從藤原泉三郎、上清哉的自述中，可以看到他們受到中野重治及其普羅詩影響而左傾是無關實際的政治運動，而完全是透過「詩」的啟發：

我們直覺地感受刊在《驢馬》上的中野重治的詩與論文中所流動的某種真實的新生命——某種被導引向明確方向的新的真實生活，並且對之產生了信仰。

以中野的詩為契機，我們的視野急遽地被打開。不論是我還是你，都終於找到了朝向一個正確方向的真正的詩的道路——至今為止追求多年的自己的詩的（也是生活的）道路。²¹

中野重治的詩與詩論，逐漸在我們面前指示出一個明確的方向，我們的視野清楚分明地開展了出去。對我們來說，那是照亮暗夜的新的真理之火，也是將一直沈睡在我們精神中的高邁詩情攫取出來的強而有力的時代之聲。從那之後的兩年當中，藤原與我持續著最後的拚命掙扎痛苦的日子。然後，我們好不容易活到了今天。然而，路還很長。是還很漫長的荊棘之道。我們非得踏過荊棘前進不可。那對我們時代的「良心」來說，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方向——²²

要理解這兩段話，必須先考察當時他們所讀到的《驢馬》雜誌上中野重治的詩與詩論的內涵。《驢馬》發行於一九二六年四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共十二號，由室生犀星召集堀辰雄、窪川鶴次郎、中野重治、西澤隆二、

20 此事在1930年兩人為彼此的著作書寫的跋文當中被提及。順帶一提，為彼此的處女作書寫跋文，應是模仿萩原朔太郎《吠月》（月に吠える）（1917年）和室生犀星《愛的詩集》（愛の詩集）（1918年）的做法。藤原泉三郎：〈よき友情の紀念に〉，上清哉：《詩集 遠い海鳴りが聞えてくる》（臺北：南光書店，1930年2月），後記頁1-19。上清哉：〈藤原泉三郎と僕〉，藤原泉三郎：《陳忠少年的話》（臺北：文明堂書店，1930年11月；復刻：東京：ゆまに書房，2001年9月），後記頁1-18。

21 前掲藤原泉三郎：〈よき友情の紀念に〉，後記頁16。本文引文皆為筆者自譯。

22 前掲上清哉：〈藤原泉三郎と僕〉，後記頁17。

宮木喜久雄、平木二六參與創刊，寄稿者則包括芥川龍之介、萩原朔太郎、千家元麿、高村光太郎等。這份名單呈現出活躍於大正期的重要文學者，以及昭和期擔任現代主義、普羅文學重要角色的新進文學者的交會。²³可以看到藤原和上所熱愛的「感情詩派」詩人萩原朔太郎與室生犀星也參與其中。一九二七年二月，藤原泉三郎由名古屋至東京拜訪舊識宮木喜久雄時，宮木正參與《驢馬》的編務，並固定與《驢馬》同人在住處召開編輯會議。藤原因此機緣而從宮木手中獲得了創刊號以來的整套《驢馬》雜誌。²⁴

北川透認為，創刊《驢馬》這件事是中野重治文學生涯的一個重大轉機，因為在《驢馬》上所發表的這一批詩與詩論，讓中野重治從至今為止的具抒情資質的世界，飛躍性地轉換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學理念。中野重治在《驢馬》上發表了〈關於詩的兩三個斷片〉（詩に関する二三の断片）（後更名為〈關於詩的斷片〉（詩に関する断片））這篇被認為與青野季吉〈自然成長與目的意識〉齊名的論文。²⁵文中指出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共產主義入門》中的獻辭是「最純粹的抒情詩」，原因是「與一個女人對一個男人的情念，在性質上是顯著的個人主義與獨善其身、甚至可能時而頹廢時而自棄正好相反，這裡所披露的感情，是集體主義且光明的，也甚至揭示了對所屬集團的透徹理論與強大力量深厚的愛與信賴」。²⁶如此捨棄個人的抒情而走向集體的抒情，宣告了中野重治連結抒情詩與普羅詩的新方向。中野重治在《驢馬》上所發表的詩作基本上循此新方向創作，其中又以〈天亮前的再見〉（夜明け前のさよなら）一詩最具代表性。此詩描寫敘述者與同志在租賃處二樓為「工作」密商後離去，租賃處的其他青年和房東夫婦都是運動的同情者，詩中以感性的語調道別，溫情地喚起與運動者與民眾之間的連帶感。²⁷

23 藤本寿彦：〈驢馬 解題〉，現代詩誌総覧編集委員会編：《現代詩誌総覧（1）前衛芸術のコスモロジー》（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96年7月），頁358。

24 前掲横路啟子：〈論臺灣地區日本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的共同體意識變化問題——以藤原泉三郎為中心〉，頁33。

25 前掲澤正宏：〈第三章 プロレタリア詩 概観〉，頁66。

26 中野重治：〈詩に関する断片〉，《藝術に関する走り書の覚え書》（東京：白鳳社，1971年4月），頁191。最初發表於《驢馬》第3號（1926年6月）。

27 中野重治：〈夜明け前のさよなら〉，《中野重治詩集》（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12月），頁62-64。最初發表於《驢馬》第2號（1926年5月）。

一九二七年，在藤原泉三郎帶著整套《驢馬》回到臺灣以後，藤原泉三郎與上清哉兩人便一改過去抒情感傷的詩風。首先，上清哉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發表長詩〈我看見了〉（僕は見た）一詩，描寫「我」所觀察的酒店女子的職場生活及背後辛酸，²⁸可以看到其轉往普羅詩底層描寫的傾向。另一方面，他在一九二八年發表的幾篇論述〈第二次國民創作時代與其他〉（第二次國民創作時代その他）、〈錦町消息〉（錦町たより）中，²⁹高呼普羅文學時代的到來、批判自己過去的藝術至上主義、引用中野重治在《驢馬》上的詩並肯定其為日本普羅詩的正確方向等，也都明白宣示了自己朝向普羅詩轉換的新時代的到來。再者，藤原泉三郎則從一九二八年開始以「榑崎恭一郎」為筆名，發表如〈俄國文學斷片〉、〈《天亮之前》與其他 藤村斷片〉（『夜明け前』其の他 藤村斷片）等批判資本主義的文藝評論，³⁰並與宮崎震作針對普羅文學的正當性掀起論戰。³¹一九二九年一月，他再以「長崎洋吉」為筆名發表長詩〈在那霸的碼頭〉（那霸の波止場にて）。³²此詩是對《驢馬》上的中野重治〈汽車 三〉一詩的模仿，描寫從那霸碼頭啟程的女工以致敬中野詩中從火車站啟程的女工。³³從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的詩與詩論中可以清楚看到對中野重治的亦步亦趨。然而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此時對於底層階級仍停留於表面的同情。或許他們在論述當中表明了朝向普羅詩的意識轉換，但在實際的詩作上沒有揭露

28 上清哉：〈僕は見だ〉，《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26日。

29 上清哉：〈第二次國民創作時代その他〉，《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2月24日；上清哉：〈錦町たより〉，《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5日；上清哉：〈錦町たより 芥川龍之介の事他亡斷想—〉，《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19日；上田平清藏：〈錦町たより 半鐘か 鳴ると火事か 起る話など〉，《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10日。

30 榑崎恭一郎（筆者按：應為「榑崎恭一郎」之誤）：〈露西亞文學斷片〉，《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17日；榑崎恭一郎：〈『夜明け前』其の他 藤村斷片（上）〉，《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2月4日；榑崎恭一郎：〈『夜明け前』其の他 藤村斷片（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2月11日。

31 榑崎恭一郎：〈天才の新時代評論家 宮崎震作氏の頭の分析的批判〉，《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5日；榑崎恭一郎：〈お断り〉，《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12日；榑崎恭一郎：〈問題の中心は何處にある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26日。

32 長崎洋吉：〈那霸の波止場にて〉，《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月28日。

33 中野重治：〈汽車 三〉，《中野重治詩集》（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12月），頁99-103。最初發表於《驢馬》第9號（1927年2月）。

也難以批判是什麼結構性的因素造成了帝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悲劇，³⁴故實際上無法表現出中野重治的普羅詩的深度及內涵。

參、日本普羅詩的繼承：《無軌道時代》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透過模仿中野重治的詩來進行對於普羅詩的摸索的同時，誠如本文第一節所述，日本文化界正經歷翻天覆地的動盪。林淑美透過中野重治於一九二九年發表的名詩〈下雨的品川車站〉（雨の降る品川駅）中伏字的還原，解析中野重治對這段時期的「國家意識形態諸裝置」的深切反抗。³⁵面對一九二八年治安維持法中的「緊急敕令」以及昭和天皇即位式「御大典」這兩項國家對於國民意識形態的統一行動，遵從二七綱領而確立打倒天皇制的路線的日本共產黨基本上是無法與之對抗的。³⁶在國家權力與反體制運動的碰撞之下，一九二八年發生三一五大檢舉、在日從事左翼運動的被殖民者被逐出日本。這便是中野重治〈下雨的品川車站〉詩中敘述者對朝鮮同志們道別的背景。同時也是「納普」與其機關雜誌《戰旗》成立的背景。

「納普」與《戰旗》的成立對一九二九年《無軌道時代》在臺灣創刊有著直接的影響。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即有記述：

自昭和 4 年（1929 年）春天起，寄送到島內的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機關報《戰旗》有逐漸增加的傾向，在此時候，臺北的左翼文學青年以上清哉、藤原千三郎為中心，構成了普羅列塔利亞文

34 在一戰以後日本的資本主義急速擴張當中，沖繩極度糧食不足的「蘇鐵地獄」當中造成大量向外移民：〈在那霸的碼頭〉當中提到的大阪即是其人口流出的大宗。為了讓沖繩人可以順利至他縣就業，沖繩縣廳更積極地透過教育來加強沖繩人的日語能力、風俗禮儀與國體概念等，可以說是直接促成了沖繩的「國民統合」（參見近藤健一郎：《近代沖繩における教育と国民統合》（北海道：北海道大学，2006年2月）。以這個角度來說，藤原泉三郎的〈在那霸的碼頭〉找到了一個相當好的、甚至可以跟殖民地臺灣相互呼應的題材，可惜沖繩的特殊性在此詩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35 林淑美：〈詩「雨の降る品川駅」とは何か——昭和三年の意味〉，《昭和イデオロギ— 思想としての文学》（東京：平凡社，2005年8月），頁13-111。

36 林淑美：〈詩「雨の降る品川駅」とは何か——昭和三年の意味〉，頁67。

藝研究團體，以雜誌《無軌道時代》進行初步活動，於同年 12 月擬定計劃設置戰旗社支局而做成以下的支局組織草案。³⁷

相較於《沿革誌》當中的記述，《無軌道時代》從籌備會議到專欄自述中，皆沒有明白地強調其自身的普羅文學傾向。一九二九年八月，藤原泉三郎、上清哉與其他二人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宣布即將創辦新的詩雜誌。雜誌的主要方針是希望形成自由的創作團體、培養年輕人才、並打算舉辦各種文藝活動，甚至有意出版年刊詩集與個人詩集等。文末公布聚會的時間地點，邀請認同此理念的人同來齊聚一堂。³⁸兩週後，於同報公佈《無軌道時代》的刊名、同人名單與規約，並記述前述聚會的盛況。雜誌社的地址則設在藤原泉三郎的住所。³⁹



無軌道時代發刊準備會の集り（水月喫茶店にて）

【圖一】《無軌道時代》創刊籌備會於水月喫茶店（1929年8月17日）⁴⁰

- 37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一冊・文化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中譯版〕）》（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6月），頁405。沿革誌當中的藤原泉三郎皆誤記為「藤原『千』三郎」。
- 38 藤原泉三郎、上清哉、宮尾進、谷口多津雄：〈新しく詩の雜誌を發刊するについて〉，《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12日。
- 39 〈「無軌道時代」の誕生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26日。
- 40 〈無軌道時代發刊準備會の集り（水月喫茶店にて）〉，《無軌道時代》創刊號（1929年9月），無頁碼。

九月，《無軌道時代》正式發行創刊號。創刊號的專欄中提到：「《無軌道時代》並不是以自身擁有並強調一個傾向為目的的雜誌，而是文藝愛好者的自由俱樂部」。⁴¹基於這段發言，中山侑認為《無軌道時代》一開始並無任何立場，到了第三號才轉向馬克思主義。⁴²然而，即使並未標舉自身的普羅文學傾向，《無軌道時代》其實從一開始就顯露出對於日本普羅詩的親近與追隨。創刊號的「無軌道時代」專欄中，不僅批判北原白秋及西條八十是「御用詩人」，認為「監視並且暴露那種基於無知與魯鈍與現代的才能而敢於擔任反時代、反動的角色之偏愛國主義詩情的人，才正應該是我們二十多歲青年的高邁的詩精神。」而且也引用中野重治的話：「大凡樹立新的詩論這件事，有必要有所顧慮和謙虛嗎？」⁴³明白表現對順從國家權力的舊時代的詩人及其詩與詩論的揚棄。而且，創刊號便已刊登意識鮮明的普羅詩，如〈在貯炭場〉（貯炭場で）與〈示威〉（デモ）二詩。

〈在貯炭場〉描寫敘述者「我」在貯炭場受到資本家壓迫勞動的情景，相當典型地揭露勞動者的悲慘現況、資本家的惡形惡狀，並藉此喚起其他勞動者的反抗意識。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擁有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的普羅詩中所沒有的重要質素——由第一人稱的勞動者視角出發的現實感。這種現實感的刻劃，源自一九二〇年《勞動詩集・在底層歌唱》。這本被視為日本普羅詩濫觴的詩集，在詩史上的意義是「被壓抑的勞動者將自身姿態確切地形象化，並且向同樣為勞動者的人們發出呼告」。⁴⁴這種由不需等待他者解釋的「我」出發的視角，根本上不同於過去由第三人稱角度「眺望」勞動者並寄與同情的民眾詩派。⁴⁵前面提到的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的普羅詩，不論是書寫命運悲慘的酒店女子、還是前途多舛的工廠女工，敘述者終究是從外部「眺望」。〈在貯炭場〉確切點出「我」勞動的地點為

41 XYZ：〈無軌道時代〉，《無軌道時代》創刊號（1929年9月），頁10。

42 志馬陸平（中山侑），〈青年と臺灣＝文學運動の變遷＝〉，《臺灣時報》，1936年12月，頁113。

43 S：〈無軌道時代〉，《無軌道時代》創刊號（1929年9月），頁10。

44 前掲澤正宏：〈第三章 プロレタリア詩 概観〉，頁65。

45 林淑美：〈プロレタリア詩〉，和田博文編：《近現代詩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年4月），頁194-195。

「港邊的貯炭場」——在臺灣，明顯指的是位於基隆的八尺門貯炭場（現阿根納造船廠遺址）。此貯炭場為一九一六年大稻埕企業家黃東茂向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承租土地而設立，利用鐵道將深澳坑復振炭礦所開採的煤炭集散此處，再透過基隆碼頭輸往各地。⁴⁶此詩以第一人稱「我」描寫出了搬運煤炭所需的勞動者在此貯炭場所受到的剝削與虐待，這樣的現實感是在總督府內務局以及中央研究所工作的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難以寫出、亦似乎無意經營的。

而〈示威〉一詩則描寫「我們」無產者在街頭示威遊行的情景。詩中鼓吹「我們要像軍隊一樣前進」「我們不怕X劍的聲音」「衝入X X隊伍」「佔領大馬路、騷動夜晚」等激進的內容，也是在藤原泉三郎或上清哉的作品中無法看到的。如此明白煽動街頭抗爭，且並沒有被檢閱削除或禁止出版的詩，在殖民地臺灣可謂少見。在當局針對左翼運動的檢舉已漸次開始的年代，也許是僥倖留下的一首也說不定。臺灣圖書館館藏版本的《無軌道時代》，從封面上的印章可知是繳送警務局保安課圖書掛的納本。其內頁中，可以看到〈示威〉幾乎通篇被劃線，可知這樣的內容確實已騷動當局的神經。任憑創刊號自稱「不是以自身擁有並強調一個傾向為目的的雜誌」，也的確刊登了許多並非普羅詩的詩作，但當〈在貯炭場〉與〈示威〉這樣的詩登場之際，便已經表明了立場。

46 許峰源：〈阿根納造船廠的歷史風華〉，《檔案樂活情報》第147期（2019年9月16日）。來源：<https://www.archives.gov.tw/ALohas/ALohasColumn.aspx?c=1980>，檢索時間：2021年4月10日）



俺達は X 劍の音や
 いかめしい殺音を恐れない
 俺達の前後左右は皆俺達だ
 人形のやうに立ち並んだ X の列を
 俺達は何の慥面もなく衝き進む
 俺達の足並は明るく歡樂の巷の方へ流れる

其處には自らの惨めさを粉らさんとして
 酒に肉に酔ひしれる者達の群
 お、君達小市民インテリゲンチヤ達
 暴れ狂ふ大資本に魂をば打ちひしがれた君達
 君達もまた我々の兄弟だ
 その哀しき酒杯を捨てよ
 そのひき籠んだ囀りを捨てよ
 此の市街を貫き、此の世紀を貫いて燃えあがり衝き進
 む俺達の列に入れ
 お、此の市街を貫いて
 衝き進む俺達の力強い足踏みを開け
 大道を占領し、騒夜を獲得し
 今こそ俺達無産者の方が
 どの様に強いか、どの様に大きいかが
 高らかに、高らかに叫ぶ時だ

-[16]-

【圖二】 外山泉二〈デモ〉原件遭劃記情形⁴⁷

值得一提的是是在第二號中，藤原泉三郎發表了比之前更貼近其個人現實經驗的詩作：

「阿呆塔の唄」／榎崎恭一郎

〈阿呆塔之歌〉／榎崎恭一郎

晝の休み前だ

午休之前

47 外山泉二，〈デモ〉，《無軌道時代》創刊號（1929年9月），頁16。

俺は茫然と窓によつてゐる	我茫然地靠著窗
麗かな五月の青空に	在明媚的五月藍天下
傲然と十二階の阿呆塔が聳えてゐる	十二層樓的阿呆塔傲然聳立
こいつは醜怪だ	這傢伙又醜又怪
こいつは嘲笑つてゐる	這傢伙在嘲笑著
此の中へはいつた時	只要走進這裡
人間は機械になる	人類就會變成機械
あらゆる人間性が封印される	一切人性都會被封印
（人間性の封紙には辭令が最も強靱だ！）	（在人性的封紙中，任免令是最強靱的！）
勳章と云ふ金屬塊をぶら下げた電氣人形達	配戴所謂勳章這種金屬塊的機器人們
おゝ そいつらが傲然と横行する	啊 這些傢伙高傲地橫行
そして青白い瘦せこけた電氣人形達	蒼白骨瘦的機器人們
彼等は一齊に廻轉する——	他們一齊迴轉——
これはまた大きなメカニツク ⁴⁸	這是更大的機械
（行政！）	（行政！）
精巧な制度だ	精巧的制度
強壓なX取機だ	高壓的X取機
麗かな五月の青空に	在明媚的五月藍天下
傲然と十二階の阿呆塔が聳えてゐる	十二層樓的阿呆塔傲然聳立

48 「メカニツク」一詞之語源為英文的「mechanic」，原意為機械工、技工。然而，此處若翻譯成「這是更大的機械工」語意並不通。日文版維基百科提供一說，即：「在日本昭和世代等的和製英語（或者說是誤用）當中，有人將メカニツク當作『機械』的意思來使用。這對英文母語者來說是不通的。正確來說應該是 Machine(マシーン)才對。」故筆者在此處將メカニツク翻譯為「機械」。「メカニツク，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來源：<https://ja.wikipedia.org/wiki/メカニツク>，檢索時間：2021年8月10日）。

十二時——

モータ・サイレンの響が激しく俺の

耳を打つ

はげしく俺の耳を打つ

五月の青空一杯に傲然たる此いつの

哄笑がひびいて来る

俺は、俺は海底に沈んで行く爆彈の

やうに

ちいつと俺の反逆心を押へてゐる⁴⁹

十二點鐘——

自動鳴笛の響聲激烈敲擊我的耳朵

激烈敲擊我的耳朵

五月的藍天下響徹這傢伙的高傲大

笑

我，我就像沈進海底的炸彈一樣

隱忍壓抑著我的反抗心

這首詩呈現了在臺灣總督府內務局擔任雇員的藤原泉三郎眼中的「阿呆塔」——臺灣總督府的戲稱。五月的藍天下，失去人性的機器人們在龐大的國家機器中身不由己地運轉著。敘述者感到茫然、恐懼、憤怒，尖聲大笑般的午休鳴笛重擊他的耳朵，將他的痛苦推向最高峰。全詩最後看似以內斂的隱忍作結，但詩中對於異化與壓抑人性的總督府投向的憤恨眼光卻顯得鮮明而強烈。雖然普羅詩多給人如前述的〈在貯炭場〉或〈示威〉這般書寫勞動或革命的印象，但林淑美指出，普羅詩所要探問的並不僅只是底層勞動者被剝削這件事，而是人類被編入整個社會構造的生活方式：「普羅詩這個文類出現的意義的必然，不只有在勞動者或民眾之上，而是作為在日本文化出現的資本主義經濟構造中被收編的所有人之上」。⁵⁰林淑美舉《驢馬》雜誌上中野重治的〈帝國飯店〉（帝国ホテル）一詩為例，認為此詩將帝國飯店描寫為毫無懸念地接受作為日本資本主義象徵的西洋殖民樣式並加以再生產的東洋人意識的象徵。出入此處的人並沒有注意到，這樣的意識與囚犯是一樣的、帝國飯店也與監獄是一樣的這件事。——普羅詩出現的意義是將這樣的詩化為可能。⁵¹在〈阿呆塔之歌〉所描寫的總督府裡的白領階級被國家機器所操控而毫無感覺、甚至驕傲橫行的景象，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揭露了中野重治所要控訴的日本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構造當

49 樺崎恭一郎：〈阿呆塔の唄〉，《無軌道時代》第2號（1929年10月），頁6。

50 林淑美：〈プロレタリア詩〉，和田博文編：《近現代詩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年4月），頁193-194。

51 林淑美：〈プロレタリア詩〉，頁196。

中的一部份。比起藤原之前的〈在那霸的碼頭〉一詩更立體且具備切身之感。可惜的是，這首詩描寫總督府這個極具象徵意味的對象，照理來說更有機會能夠觸碰到日本在臺殖民體制對於整個殖民地臺灣、對於殖民地人民的控制與壓迫等帝國資本主義的結構的核心，但藤原泉三郎再一次只停留在「階級」問題上，而與「民族」問題擦身而過。

在接下來的《無軌道時代》中，藤原泉三郎發表獻給《朝向馬克思主義之道》作者的〈致阿·沙波瓦洛夫〉（ア・シヤボワロフへ）（第3號）、獻給《年輕時的信》作者的〈致我的查爾斯·路易·菲利普〉（私のシャルル・ルイ・フィリップに）（第4號）等詩；上清哉則發表隨筆〈中野重治與我〉、利用雜誌側欄轉載中野重治的〈關於詩的斷片〉（以上第3號）等等，繼續貫徹兩人的路線。而其他同人則接連發表像上述描寫勞動或鼓吹反抗的普羅詩，如黑田只雄〈我看見了〉（俺は見た）鼓吹被野獸撕裂的同志們為了自由解放而建立自己的新世界（第2號）；高羅部達治〈我們知道的〉（俺達は知つてゐる）高呼即使背叛父母手足妻兒也要為自由戰鬥；里村好雄〈軍隊遊戲〉（兵隊ゴッコ）嘲諷軍隊的訓練是在磨練殺人技術（以上第3號）；つじ・としを〈碼頭苦力之歌〉（波止場人夫の唄へる）刻劃碼頭苦力「我」在勞動中體驗的視覺觸覺嗅覺等實際感受；內田英繼〈站在人生的街頭〉（人生の街頭に立つて）描繪失業者「我」的絕望與徬徨心境（以上第4號）等等。不同面向的書寫已脫離藤原和上的中野重治抒情普羅詩路線，呈現出更具煽動與戰鬥性的日本普羅詩風貌。



【圖三】《無軌道時代》各期封面⁵²

52 圖版來源：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

然而，不論是中野重治路線或者藏原惟人路線，在殖民地臺灣發刊的《無軌道時代》中的詩作，並沒有如《戰旗》中的〈下雨的品川車站〉一樣透過殖民地連帶來暴露出日本帝國統合過程中的暴力性。由此可知，不只是藤原泉三郎，在該雜誌上書寫普羅詩的在臺日人都存在著避談民族這個共同的問題。這讓持續發刊四期、普羅色彩越趨明顯與濃厚的《無軌道時代》無法反映出殖民地特殊的現實狀況、沒有反映出當時第三國際除了「無產階級革命」之外希望進一步推動的「民族解放」理念。關於這個部分將於第五節繼續探討。

肆、中國普羅詩派的移植：《洪水報》與《赤道》

從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模仿中野重治寫詩，到一九二九年一群在臺日人齊聚在水月喫茶店討論文藝愛好者的團結的這段時間，臺灣人文化界似乎沒有那樣的餘裕。一九二七年，臺灣文化協會由左派取得主導權而成為新文協，蔡培火、蔣渭水等則另組臺灣民眾黨；一九二八年，臺灣共產黨透過第三國際的指示在日本共產黨的協助下成立，之後取得新文協的實際領導權。⁵³新文協在一九二八年發行《臺灣大眾時報》、一九三〇年再發行《新臺灣大眾時報》作為其言論機關，⁵⁴但該刊是以政治論述與左翼運動之報導為中心，並無刊登任何文學作品。⁵⁵

一九三〇年，多份中文普羅雜誌接連創刊，使上述的情況有了轉變。《沿革誌》即提到：「進入昭和五年（1930年）後，在經濟恐慌及其他各種情勢好轉的影響下，〔臺灣的普羅文化運動〕呈顯出明顯的復活狀態」，

53 詳見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4月），頁76-93。

54 上述《臺灣大眾時報》與《新臺灣大眾時報》創刊至停刊之經緯，詳見若林正丈：『台灣大眾時報』，《臺灣大眾時報週刊 創刊號—第十號（復刻版）》（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8月），頁1-8。

55 根據《臺灣大眾時報週刊 創刊號—第十號（復刻版）》（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8月）、《新臺灣大眾時報 創刊號-第二卷第四號（復刻版）》創刊號-第二卷第四號（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8月）。

⁵⁶並舉出了由臺共黨員與「納普」聯絡後所創刊的《伍人報》、由伍人報社所分裂出去的《明日》、《洪水報》，以及臺共與新文協成員成立的《臺灣戰線》、《新臺灣戰線》等雜誌。這些雜誌中，《伍人報》、《臺灣戰線》、《新臺灣戰線》等尤其有意要成為臺灣普羅文藝運動的推動者。⁵⁷戰後，王詩琅專文介紹上述這幾份雜誌，雖然文中刻意不提這些雜誌與臺灣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但肯定這些雜誌「為了臺灣文藝鋪下一段不短的康莊大道」。⁵⁸而河原功進一步主張《赤道》、《現代生活》等雜誌等亦具有普羅色彩。⁵⁹近年，柳書琴主編的《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文學辭典》，對於一九三〇年創刊的《伍人報》、《明日》、《洪水報》、《現代生活》、《赤道》等辭條的編撰也更拓展了我們這對幾份雜誌的認識。⁶⁰

然而，上述普羅雜誌的散佚情況嚴重，目前僅能透過現存的《洪水報》與《赤道》考察其中的普羅詩刊登狀況。首先，在七種雜誌當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伍人報》、《臺灣戰線》、《新臺灣戰線》盡皆散佚，《明日》、《洪水報》、《赤道》、《現代生活》則僅可見部分。其次，若細究其內容，《明日》為無政府主義雜誌，⁶¹《現代生活》則被《新臺灣大眾時報》譏諷為右翼反動刊物之一。⁶²因此《洪水報》與《赤道》是目前唯二能夠作為普羅雜誌並觀察其中普羅詩刊登情況的史料。許俊雅曾細緻比對《洪水報》與《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考證其中內容轉載的來源。考證的結果，《赤道》的內容多轉載自與中國創造社有關的《創造

5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一冊·文化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中譯版〕）》（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6月），頁401。

57 同前註，頁401-404。

58 王一剛（王詩琅）：〈思想鼎立時期的雜誌〉，《臺北文物》第3卷第3期（1954年12月），頁131。

59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臺北：全華，2004年3月），頁161-163。

60 柳書琴主編：《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文學辭典》（臺北：聯經，2019年6月），頁405-410。

61 中島利郎：「明日」辭條，柳書琴主編：《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文學辭典》，頁406。

62 柳書琴，「現代生活」辭條，柳書琴主編：《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文學辭典》，頁408-409。柳書琴指出該刊「成員中包含了許乃昌、賴和、周天啓等具左翼思想的知識分子，應為具社會主義色彩的刊物。」根據筆者考察，該刊新詩作品以描寫愛情、婚姻、現代生活為主，未見普羅詩。故不放入本文討論範圍。

月刊》、《流沙》、《文化批判》、《我們》等雜誌，因此，許俊雅提出《洪水報》與中國的創造社較無淵源，而《赤道》則與創造社有密切關係的結論。⁶³

透過許俊雅對《洪水報》與《赤道》的轉載中國作品的考證，可以觀察到另外一個重要事實：這兩份雜誌轉載的詩作多與中國普羅詩派有關。筆者重新考據兩刊，將許俊雅考證中詩的部分加以整理，再增補該文未論及的《赤道》第三、五號及其他遺漏，整理成下表：

【表一】《洪水報》與《赤道》對於中國新詩之轉載情形⁶⁴

刊名	期數	發行時間	詩作	原作	出處	
					許俊雅考證	筆者考證或增補
洪水報	1	1930.8	劉宗敏〈無題〉	仿擬魯迅〈我的失戀——擬古的新打油詩〉	《語絲》週刊第4期	1924.12.8
	1	1930.8	格〈空中羣雁〉	改寫沈廣連〈空中羣雁〉		《平民之友》第4期，1924.6.27
	3	1930.9	沙陀菲耶夫作、畫室譯〈地、改變著姿態！〉	轉載馮雪峰譯作	不詳	《洪水》2卷15期，1926.4.16 ⁶⁵
	3	1930.9	平平〈勞苦與飢難〉	襲用蔣光慈〈在黑夜裡——致劉華同志之靈〉	蔣光慈，《戰鼓》下卷，上海：北新書局，1929.6	原出處：《民國日報·覺悟》12卷24期，1924.12.24
				襲用蔣光慈〈昨夜裏夢入天國〉	蔣光慈，《戰鼓》下卷，上海：北新	

63 許俊雅：〈《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臺灣文壇〉，《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4期（2012年4月），頁169-218。

64 筆者製表。

65 此詩許俊雅已考證出為馮雪峰譯詩，但並未說明該譯詩出處，此出處項目由筆者補足。

					書局， 1929.6	
				襲用戴季陶〈 阿們?!〉	《星期評 論》第36 期	1920.2.8
赤道	1	1930.1 0.31	嘉洵作、曇華譯 〈新俄詩選·泥 水匠〉	轉載葉靈鳳譯 作	不詳	《戈壁》1 卷3期， 1928.6.1 ⁶⁶
	1	1930.1 0.31	一勞動者〈無產 者的喊聲〉	詩末數句襲用 馮憲章〈匪徒 的喊聲〉	《太陽月 刊》第7期	1928.7
	2	1930.1 1.15	加斯特夫作、曇 華譯〈新俄詩選 ·工廠的汽笛〉	轉載葉靈鳳譯 作	不詳	《戈壁》1 卷3期， 1928.6.1 ⁶⁷
	2	1930.1 1.15	馮乃超〈快走〉	馮乃超〈快走 〉	《創造月 刊》2卷2 期， 1928.9	
	3	1930.1 1.30	孤鳳〈拖纜夫之 歌〉	孤鳳〈拖纜夫 之歌〉		《我們》第 3期， 1928.8
	4	1930.1 2.19	麥克昂〈我們在 赤光之中相見〉	郭沫若〈我們 在赤光之中相 見〉	《孤軍》2 卷1期， 1923.12	
	4	1930.1 2.19	吳乃立〈這不是 我們的世界〉	吳乃立〈這不 是我們的世界 〉	《文化批 判》第4號 ，1928.4	
	5	1931.1. 17	一勞動者〈那裏 有我們可喜的新 年?〉	第一句襲用吳 乃立〈這不是 我們的世界〉		《文化批判 》第4號， 1928.4

從上表可以觀察到一些重要的線索：其一，是《洪水報》與《赤道》的詩作轉載的來源雜誌幾乎都來自上海。其中《創造月刊》和《太陽月刊》是普羅詩派的大本營，郭沫若和蔣光慈更是普羅詩派的代表人物。其二，在所謂的轉載、改寫、襲用、仿擬的過程中，《洪水報》和《赤道》各自體

66 此詩許俊雅已考證出為葉靈鳳譯詩，但並未說明該譯詩出處，此出處項目由筆者補足。

67 此詩許俊雅已考證出為葉靈鳳譯詩，但並未說明該譯詩出處，此出處項目由筆者補足。

現了其雜誌自身的性格，也體現了對「怎樣的普羅詩適合於殖民地臺灣」這個問題的思考。以下就這兩點分別論述。

首先，是中國移植至臺灣的普羅詩的出處皆是來自上海這件事。上述普羅詩的轉載出處，除《語絲》是在北京發行以外，《戈壁》、《洪水》、《民國日報·覺悟》、《星期評論》、《太陽月刊》、《創造月刊》、《孤軍》、《文化批判》、《平民之友》、《我們》、《拓荒者》全部都是在上海發行。眾所皆知，上海是臺灣留學生在中國從事左翼運動的根據地，同時也是東亞「左翼文化走廊」的一個重要節點。⁶⁸「上海臺灣學生聯合會」於一九二五年成立，之後便越來越加深其共產主義傾向、組織讀書會、並與島內的臺灣文化協會聯絡，為臺共組黨作準備。⁶⁹這當然使得留中的臺灣知識份子更容易接觸到上述這些在上海發行的文藝雜誌。更重要的是，中國普羅詩派的崛起地也正是上海——一九二五年，五卅事件爆發，喚起了中國文化界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與階級意識。原本主張為藝術而藝術、以浪漫主義為主的創造社轉向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郭沫若便是代表詩人。⁷⁰《洪水》、《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皆為創造社創辦的雜誌。此可謂中國普羅詩的萌芽時期。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途中，蔣介石下令清共。在中共的觀點來說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四一二反革命政變」。⁷¹蔣介石在上海對於工人與共產黨員的屠殺，一方面讓中共的政治運動轉入地下，另一方面卻也使得作為文藝運動的普羅詩派走向高峰。⁷²蔣光慈的太陽社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立。其創辦的《太陽月刊》、《拓荒者》為一脈相承的雜誌。⁷³其後，同在上海的創造社和太陽社作為普羅詩派

68 詳參前揭柳書琴：〈左翼文化走廊與不轉向敘事：臺灣日語作家吳坤煌的詩歌與戲劇游擊〉，頁 163-200

69 前揭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一冊·文化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中譯版〕》，頁 109-110。

70 龍泉明：〈普羅詩派詩歌創作得失論〉，《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31 期（1997 年 7 月），頁 74。

71 詳見華崗：《中國大革命史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 年 5 月）。

72 前揭龍泉明：〈普羅詩派詩歌創作得失論〉，頁 74。

73 舒蘭：〈柒、普羅派和民族派時期〉，《中國新詩史話（二）》（臺北：渤海堂文化，1998 年 10 月），頁 5。

的大本營，於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締造了中國普羅詩派一時的盛世。其他非直接由這兩社所創辦的上述雜誌也多少與他們有所關連。這些雜誌自然也成為一九三〇年在臺灣創刊的《洪水報》和《赤道》直接學習取材的對象。

接著是關於《洪水報》和《赤道》如何透過轉載、改寫、襲用、仿擬等方式「學習」中國普羅詩派的問題。柯文溥〈論「普羅詩派」〉一文透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的《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畸形》、《思想月刊》、《太陽月刊》、《我們月刊》、《海風周報》、《引擎》、《拓荒者》等十種左翼文藝雜誌來勾勒中國普羅詩派的整體樣貌。⁷⁴觀察這些雜誌中的普羅詩，並且與之和上述《洪水報》和《赤道》的轉載名單比對，即可了解臺灣人移植中國普羅詩派時選擇與剔除了什麼。

就《洪水報》而言，其刊登的詩作性質比較駁雜，可以看到非共產主義的路線也都交織於其中。除了轉載的魯迅〈我的失戀——擬古的新打油詩〉、沈廣連〈空中羣雁〉、戴季陶〈阿們?!〉等詩與普羅詩派並無關聯以外，原創詩作如王詩琅〈冬天的監獄〉是偏無政府主義路線、郭水潭的日文詩作〈巡禮之旅〉（巡禮の旅）、〈馬啊？飼主〉（馬よ？飼主は）則是偏《南溟樂園》的民眾詩派路線。但是《洪水報》卻也並非如許俊雅所言「整本刊物與創造社並無多大關係」。⁷⁵根據表一，平平〈勞苦與飢難〉所襲用的蔣光慈〈在黑夜裡——致劉華同志之靈〉一詩是出自創造社發行的《洪水》，全詩紀念在五卅慘案以後帶領工運其後被逮捕槍決的劉華。而由湖畔詩人轉向支持共產革命的馮雪峰所翻譯的〈地、改變著姿態！〉一詩，則是稱頌十月革命成功以後，無產階級的作家和詩人們在民眾的驅遣中隨著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而前進。這兩首都是不折不扣的普羅詩。然而，前者〈勞苦與飢難〉只襲用蔣光慈〈在黑夜裡〉一詩中控訴上帝對人不平的部分來為工農大眾吶喊，並未觸及詩中對實際革命過程的書寫，而後者則主要表達作家需為了勞動大眾發聲的主旨。整體而言，可以看到

74 柯文溥：〈論“普羅詩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2期（1990年2月），頁50。

75 前揭許俊雅：〈《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臺灣文壇〉，頁214。

《洪水報》所移植的普羅詩是接近臺灣民眾黨以農工階級為社會運動基礎，但不訴諸階級鬥爭的路線。

相較之下，《赤道》便是鮮明的共產主義路線，將中國普羅詩派的詩作原封不動轉載的情形相對普遍。從表一可見，直接全詩轉載者有馮乃超〈快走〉、孤鳳〈拖纜夫之歌〉、郭沫若〈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吳乃立〈這不是我們的世界〉，襲用部分詩句者有馮憲章〈匪徒的喊聲〉。其中，除了〈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以外，全部是在一九二八年發表的作品。郭沫若的〈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於一九二三年發表於《孤軍》雜誌、與上述《洪水報》襲用的一九二四年蔣光慈的〈昨夜裏夢入天國〉都屬於較為浪漫抽象的詩作，但兩首詩都已經透露出他們對於理想的共產國家的嚮往。而〈匪徒的喊聲〉、〈快走〉、〈拖纜夫之歌〉、〈這不是我們的世界〉等則是由普羅詩正盛時期的代表雜誌《太陽月刊》、《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我們》等轉載而來，〈快走〉與〈拖纜夫之歌〉描寫農民與勞動者受地主與資本家壓榨的情況，〈這不是我們的世界〉則描寫目前的世界是只容許富人幸福的宮殿，必須推翻它才能夠重新建立屬於無產階級的「我們的世界」。為何《赤道》選擇以上這些詩作來轉載？誠如上述，中國普羅詩派的批判對象是從五卅慘案中的英、日等帝國主義、軍閥、到四一二政變的中國國民黨等勢力與資本主義的結合，但這樣的背景基本上與臺灣較無關聯，故《赤道》並未轉載這一類應該屬於中國普羅詩派的主力作品，即便《太陽月刊》、《創造月刊》中的普羅詩不乏揭露帝國主義列強壓迫的題材，可與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訴求相互連結，但或因檢閱或其他未可知的理由，《赤道》的編者選擇了從農民與勞動者出發、純粹控訴資本主義而與民族解放較無關聯的詩作。

值得一提的是，筆名「一勞動者」和「一無產者」在《赤道》中發表了唯二兩首原創性相對較高的作品。⁷⁶一勞動者的〈無產者的喊聲〉發表於創刊號。⁷⁷其結尾雖然襲用馮憲章〈匪徒的喊聲〉的「我們是舊社會的劊子手、／我們是新社會的創造主」；「放快呀放快一齊動手！」；「我們要

76 因篇幅甚長，故全詩引用從略。

77 一勞動者：〈無產者的喊聲〉，《赤道》創刊號（1930年10月），頁6。

毀滅現存的宇宙、／我們要創造理想的金城！」五句詩句，但兩首詩中所描寫欲改革的社會有著明顯的不同。馮憲章〈匪徒的喊聲〉描寫工廠工人因失業而不得不成為強盜匪徒，壓迫他們的對象有廠主、地主等富人以及警察、執法者等；而一勞動者〈無產者的喊聲〉的敘述者則是耕種稻米的農民，壓迫他們的是資本家與大地主、保護地主的X X（推測為「警察」）、以及「這期的X業X稅又加升」（推測為「農業徵稅」）——即使隱晦，但這裡可以看到被殖民者受到地主與殖民者的雙重剝削。不只要繳地租予地主、還需納稅予殖民政府，使農民終處於「餓到半死、／屢次自殺又不成」的景況。另一首刊登在第五號的一無產者〈那裏有我們可喜的新年？〉描寫新年時期有錢人和無產者兩樣情的社會現實。⁷⁸開頭的「金碧輝煌的禁城」一句雖來自吳乃立〈這不是我們的世界〉，但全詩內容皆與吳詩不同。詩中寫到「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天々被屈服在強X的面前」；「非根本的去X X X權、／是永無一日可以看見青天！」；「我們只要就早組織X X加入X X的X場。／不然弱肉X X、／不是他死、／就是X亡」等，雖然充滿不易還原的自我檢閱，但是觀察詩中鼓吹的革命，絕不是只針對「有錢人」，而是使整個資本主義得以運作的帝國主義「強權」。然而，或許因礙於總督府審查，兩首詩難見對殖民政府或帝國主義的明顯批判。順帶一提，這兩首詩中「生理又不繁榮」「用意呀！突X去！！」等句子可以看到混用臺灣話文（「生理」：臺語「生意」之意）以及日文漢字的情形（「用意」：日文「準備」之意），表現出了殖民地臺灣特有的詩語特色。

若比較《無軌道時代》與《洪水報》、《赤道》，可以看到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是以抒情詩來進入日本「普羅詩」，而臺灣人則是從左翼政治運動出發而通往中國「普羅詩派」。這從《無軌道時代》和《洪水報》、《赤道》的內容組成即可明顯窺知：《無軌道時代》是以詩歌為主的文藝雜誌，偶爾參入些許普羅色彩，但整體而言是以純文藝為走向，亦刊登許多與政治無關的抒情詩作；而《洪水報》、《赤道》本是由左翼政治運動者主導，鼓吹無產階級的覺醒、創造接近大眾並遠離資本主義的論述是它

78 一無產者：〈那裏有我們可喜的新年？〉，《赤道》第5號（1931年1月），頁2。

們主要的目的，詩只是其中堪稱點綴的文類。且因幾乎是轉載中國作品，故只能稱「移植」而尚未有繼承與創造。可以說，到一九三〇年為止，臺灣的中文普羅詩是仍然處於引介與接受中國普羅詩派、只為政治思想服務、並且尚未能為殖民地臺灣的實際情況發聲的階段。

伍、尚未能反映殖民地現實的普羅詩

從本文第二節到第四節對於藤原泉三郎、上清哉、《無軌道時代》、《洪水報》與《赤道》的介紹，可以看到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臺灣的日文普羅詩和中文普羅詩存在各自的問題。但倘若概略地一言以蔽之，他們的問題皆為「尚未能反映殖民地現實」。而這個問題又可以分為內容以及語言兩個部分。

首先是內容方面。普羅詩作為「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的藝術或共產主義文學的詩」，⁷⁹追求的自然是第三國際所提倡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解放。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制定的二七綱領中，第三國際明確地對日本指示要完成「殖民地的完全獨立」、「日本共產黨與日本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要保持密切聯絡，給予一切思想的、組織的支持」。⁸⁰為此，日共的確在臺共創黨時期給予了指導與協助。然而在普羅文學的實踐上，這個問題並沒有受到多少重視。中野重治是少數有意識地在詩中描寫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連帶的日本詩人，而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因追隨中野重治而開始在臺灣書寫普羅詩、創刊《無軌道時代》，照理來說是最能夠實踐「殖民地路線的普羅詩」的人物。然而實際上的狀況是，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不論在論述或者在普羅詩的創作中，都未曾跳脫自身觀察視野或思考格局的限制。他們雖然是「在臺灣」寫作普羅詩，但詩中除了出現像是「阿呆塔」這樣的場景以外，並未揭露出在臺灣壓迫殖民地人民的帝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故無法創作出屬於「臺灣的」普羅詩。《洪水報》與《赤道》則因基

79 澤正宏：〈第三章 プロレタリア詩 概観〉，澤正宏、和田博文編：《作品で読む現代詩史》（京都：白地社，1993年3月），頁65。

80 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2007年3月），頁318。

本上是直接轉載或者改寫中國普羅詩派的作品，亦未出現真正跟殖民地背景有密切相關的作品。

至於語言方面，則不只是普羅詩，而是整個臺灣文學在此時面臨的問題。日本與中國在此之前已完成各自的言文一致運動，但在臺灣卻仍不存在普及化的、能夠表記大眾的語言的文字。雖然《無軌道時代》主張「藝術是大眾之物」、⁸¹《洪水報》也說「我們所需要的文學是要表現大多數民眾生活的文學」，⁸²但並未涉及如何以大眾的語言寫出貼近其生活的文學的問題。直到黃石輝在《伍人報》中發表〈怎麼不提倡鄉土文學〉，主張文學語言應該與臺灣的勞苦大眾接軌，引爆鄉土文學論爭與臺灣話文論爭以後，這個問題才廣泛地受到討論。吳叡人指出，黃石輝的論述以「民族」與「階級」的立場提倡以臺灣話文描寫臺灣現實事物，是「與臺共關係密切的黃石輝的政治主張，也就是列寧主義的『臺灣民族解放運動』論的延伸」。⁸³亦即這樣的主張才是第三國際所提倡的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解放的正論。只是，因《伍人報》今已散佚，《洪水報》與《赤道》亦無臺灣話文詩的存在。可以說，此時期臺灣的普羅詩是無法回應鄉土文學論戰中對於文學語言應該與勞苦大眾接軌的要求。

陸、普羅詩在臺灣的突破與衰退

普羅詩尚未能反映殖民地現實的問題，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逐漸露出了正視現實的曙光。但隨著滿洲事變以後國家權力的緊縮、全島大檢舉以後文協、民眾黨、共產黨被迫解散、相關人士的被捕，使得普羅詩在臺灣面臨剛剛取得些許突破便不得不走向衰退的命運。

普羅詩開始正視殖民地現實可以從以下兩個案例得見：其一，原本各自為政的左翼在臺日人與臺灣人合流創立「臺灣文藝作家協會」、發行

81 DAM：〈無軌道時代〉，《無軌道時代》第2號（1929年10月），頁9。

82 林鐵濤：〈我們所須要的文學—平民文學—〉，《洪水報》創刊號（1930年8月），頁2。

83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卷2期（2006年6月），頁178。

《臺灣文學》雜誌，不只詩作內容逐漸貼近殖民地社會現實，也開始出現漢文欄與臺灣話文的討論。其二，從《無軌道時代》出道的唯一一位臺灣人徐淵琛開始寫出獨自的普羅詩，並在論述中有自覺地強調從殖民地臺灣出發的立場。

一、臺灣文藝作家協會與《臺灣文學》

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在《無軌道時代》停刊以後，開始推動戰旗社在臺灣設置支局的運動。除了在臺北高等學校內設置讀書會以外，也與臺共的謝雪紅、王萬得、文協的吳拱照以及其他農民組合的幹部保持聯絡，計劃發行名為《殖民地臺灣》的雜誌。從其計畫草案中的「於殖民地臺灣的革命運動現階段，論罷工的功能以及指導方針」；「左翼目前的任務。日本帝國主義資本在臺灣的統治」⁸⁴等記述來看，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確實開始朝著深入殖民地臺灣共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方向前進。但該讀書會在一九三〇年八月被檢舉。九月以後，文協的張信義繼續為此事奔走，也與日本左翼團體達成設置戰旗支局的協議，但由於當局嚴加取締，戰旗社支局一事遂無疾而終。⁸⁵

一九三一年三月，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不屈不撓，與井手薰成立「臺灣文藝作家協會」，吸納了包括王詩琅、張維賢等臺灣人成員，希望成為臺灣的「納普」。⁸⁶至此可見普羅文學統一戰線之成形。八月，機關雜誌《臺灣文學》發行，但創刊號旋即被禁。目前可見的有一卷二號、一卷三號、二卷一號三期。關於詳細的雜誌創辦經緯以及內容，可參見《沿革誌》

84 前揭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一冊・文化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中譯版〕》，頁407。

85 前揭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一冊・文化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中譯版〕》，頁407-408。

86 前揭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一冊・文化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中譯版〕》，頁408-410。

⁸⁷以及河原功⁸⁸、鳳氣至純平⁸⁹之介紹。雖然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後來退出而未見作品，其他刊登於其上的詩作也被評價為「水準並不高」⁹⁰，但是從這本雜誌可以看到對於之前的《無軌道時代》的盲點之突破。

例如在一卷三號中，李彬〈我們啊，貧農〉（俺達や貧農）一詩勾勒出殖民地臺灣農村的現實生活：

「俺達や貧農」／李彬

陸には二度みのる稲の黄金があつても
山には數億の富が藏されてるても
こ、は日本の寶庫と云はれてるても
あ、俺達や蕃薯簽だ

豐作だ萬作だ

秋のみのりは紀錄破りだ

畔⁹¹も小路も黄金の波だ
あ、俺達や蕃薯簽だ

今年の蔗作は上出來だ

「モウ國內需要量は生産され得る」

「この上は外糖に負けない生産費の低

下を圖らねばならぬ」

あ、俺達や蕃薯簽だ。

〈我們啊，貧農〉／李彬

就算陸地有一年二穫的黄金稻米
就算山裏有數億的財富藏匿
就算這裡被稱作日本的寶庫
啊 我們啊，還是只有蕃薯籤

豐收，大豐收

秋穫打破了紀錄

田埂和小路都是金黃浪潮

可是 我們啊，還是只有蕃薯籤

今年的甘蔗收成了

「已可生產國內需求量」

「接下來要以不輸給進口糖的低成本為目標」

啊 我們啊，還是只有蕃薯籤

87 前揭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一冊・文化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中譯版〕》，頁408-425。

88 前揭河原功，莫素微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頁163-165。

89 鳳氣至純平，「臺灣文學（臺灣文藝作家協會）」辭條，柳書琴主編：《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文學辭典》（臺北：聯經，2019年6月），頁410-411。

90 前揭河原功，莫素微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頁165。

91 原文如此。日文漢字「畔」和「畦」同音同義（あぜ，田埂），現今多寫作「畦」。

註 蕃薯籤とは芋を細く切つて干したもので飯の代りとしてかゆの様にしておく。南部の貧農はこれを常食としてゐる。⁹²

註 蕃薯籤是指把蕃薯切成細絲曬乾，代替米飯煮成粥來吃。南部的貧農便是以蕃薯籤為主食。

此詩在富饒寶島的官方宣傳與「我們只有蕃薯籤」的刻意對比中，尖銳揭露了殖民地農民遭受嚴重壓榨與剝削的事實。不同於《無軌道時代》、《洪水報》、《赤道》的普羅詩中主要以工人階級出發的激烈的搖旗吶喊，這首詩是以臺灣農民的角度，書寫「蕃薯籤」這個臺灣常見的飲食景觀。除了以片假名標出「蕃薯籤」的臺語發音，在詩後亦有註解說明，顯示出此為殖民地特有的飲食文化。三段結構中，第一段總體性地提到臺灣島上的物產豐富，被稱作「日本的寶庫」；第二、三段則分別敘述稻米與甘蔗的豐收。這些都是島上統治者最引以為傲、同時也是用來撐起日本帝國的自然資源。小小的島嶼能夠生產全日本「國內需求量」的砂糖、同時要繼續追求「不輸給進口糖」的低成本，憑藉的完全是剝削殖民地農民、讓他們過著除了蕃薯籤沒有其他食物可充飢的極貧生活所換來的。此詩以短短的篇幅與簡單的結構，便向讀者展示了日本帝國資本主義對殖民地臺灣層層剝削的政治經濟構造。特意描寫稻米和砂糖，也點出了臺灣在帝國經濟圈當中的位置。如此具有現實性卻又能夠讓讀者體會到深刻的不平與辛酸，作為「臺灣的」普羅詩可以說當之無愧。

而在二卷一號也提到了關於創作語言的問題。賴明弘的〈關於我們的文學的誕生〉中，即提到「我作為一個本島人在這裡提出一個要求，那就是希望能夠設置『漢文欄』這件事。要說為什麼，我們本島的我們大多數人都是熟悉漢文的、而國語則侷限在少數人當中。」⁹³此文刊登的同一期雜誌便立刻開始設置漢文欄，刊登李彬的中文詩〈媽々、別吧〉，同時也刊出了「『漢文欄』原稿募集」的徵稿啟事，可以看作是編輯者從善如流的表現。另外，在同一期中林原晉作的〈讓臺灣文學朝向大眾！〉一文，更

92 李彬：〈俺達や貧農〉，《臺灣文學》1卷3號（1931年11月），頁30-31。

93 明弘：〈俺達の文學の誕生について〉，《臺灣文學》2卷1號（1932年2月），頁4。

提到了「要設置臺灣語欄。這是絕對必要的。」⁹⁴此時經過臺灣話文論戰的洗禮，《臺灣文學》中再再都可以看到對於之前的普羅文學的路線修正。可惜刊載臺語欄的期數未見，《臺灣文學》即因遭到一再查禁而廢刊。

二、徐淵琛的普羅詩與論述

《無軌道時代》唯一的臺灣人同人徐淵琛，另一個更為人所知的名字是徐瓊二（1912-1950）⁹⁵，過去以〈島都的近代風景〉（島都の近代風景）、〈某椿婚事〉（ある結婚）等小說為人所知。近年因新的口述歷史出爐，使世人對其生平與戰後白色恐怖時代的受難經過有更進一步的認識⁹⁶。然而，論者對於徐早年的生活，尤其他的詩人身份幾乎未有著墨。一九二八年，徐淵琛作為上述《無軌道時代》水月喫茶店聚會中唯一的臺灣人出席者時僅十六歲，尚為臺北第二中學在學生。隔年，他在《無軌道時代》創刊號發表文學生涯最早的作品〈詩〉。⁹⁷〈無軌道時代〉專欄罕見地特別稱讚了這首詩：「徐君以詩觀察日常生活的苦楚的表現，其態度和意志都很棒。我期待他的精進。」⁹⁸以這樣稚拙但誠摯的抒情詩為起點，徐淵琛又陸續發表了幾首抒情詩。一九三一年，徐淵琛從臺北二中畢業，從河原功提供的《臺灣文學》執筆名單有徐瓊二的名字，⁹⁹以及吳克泰的回憶「〔徐淵琛〕曾在城內租屋同進步的日本青年共同籌組進步文藝刊物，後被日本憲兵隊發覺，前來抓他們。他們從從屋頂逃脫」¹⁰⁰來看，徐淵琛這段時間應是跟著由《無軌道時代》結識的同人藤原泉三郎、上清哉等人為創立

94 林原晉作：〈臺灣文學を大衆の中へ！〉，《臺灣文學》2卷1號（1932年2月），頁6。強調記號為原文所加。

95 詳見中島利郎：「徐瓊二」辭條，《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小事典》（東京：綠蔭書房，2005年6月），頁45；翁聖峰：「徐瓊二」辭條，柳書琴主編：《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文學辭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年7月），頁176-177。

96 林靜雯採訪、整稿：〈穿越「白色恐怖」的歲月——受難者家屬徐守綱先生口述歷史〉，《臺灣風物》，67卷1期（2017年3月），頁99-146。

97 徐淵琛：〈詩〉，《無軌道時代》創刊號（1929年9月），頁13。

98 X Y Z：〈無軌道時代〉，《無軌道時代》創刊號（1929年9月），頁10。

99 前揭河原功著，莫素微譯：《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頁165。筆者所接觸到的《臺灣文學》期數為1卷2期、1卷3期、2卷1期，此三期皆無徐瓊二的執筆紀錄，故河原功所指應為筆者尚未得見之期數。

100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8月），頁180。

「臺灣文藝作家協會」和《臺灣文學》而奔走，並且正式開始以「徐瓊二」為筆名活動。在臺灣文藝作家協會瓦解、藤原泉三郎和上清哉也停止活動後，一九三二年，徐淵琛開始發表普羅詩。

徐淵琛在一九三二年所發表的〈在山中遇見的人〉（山で會あつた人）和〈浪潮〉（波）兩首詩都是以失業為主題。一九三〇年代，一連串的經濟恐慌造成日本及殖民地臺灣皆出現失業的浪潮。徐淵琛首先在〈在山中遇見的人〉一詩描述「你」是如何三餐不繼，並以寫實的手法寫出「我」所看到的失業者瘦骨嶙峋的神態。¹⁰¹全詩以第二人稱描寫「我」對於「你」的理解，引出讀者對於失業者的心情的共感。接著，〈浪潮〉一詩，同樣是描寫失業：

「波」／徐瓊二

お、打ち寄せる經濟恐慌の波よ！
 殺氣凄慘とに滿に、毒牙を鳴らして
 全世界を震撼した波！
 波！波！罪の波！
 お前は幾多の人々を
 失業と貧困と飢餓の線上に迷はしめ
 餓死と自殺とをおしつけて來たこと
 か！
 お、罪の波！
 俺は知つてゐたのだ、
 お前をそのまゝに抛つてしまへば
 今よりも一層荒れ狂ふに違ひないこと
 を
 そして餓死と失業の大洪水を
 捲き起すに違ひないことを
 X X

〈浪潮〉／徐瓊二

啊啊，奔湧而來的經濟恐慌浪潮
 啊！
 摩響滿溢淒厲殺氣的毒牙
 震撼全世界的浪潮！
 浪潮！浪潮！罪惡的浪潮！
 你讓多少的人
 徘徊在失業與貧困與飢餓的邊緣
 被逼得走向餓死和自殺！
 啊啊罪惡的浪潮！
 我知道的
 若將你置之不理
 你絕對會比現在更加兇暴
 然後絕對會掀起
 餓死與失業的大洪水
 X X
 有罪的是誰！

101 徐瓊二：〈山で會あつた人〉，《臺南新報》，1932年1月30日。

罪なる者は誰だ！	我清楚地知道
俺ははつきりとそれを知つてゐる	X X
X X	然而這裡只有一個國家。
だかこ、にたつた一つの國がある。	是製造失業者的洪水的國家嗎？
それは失業者の洪水を作る國か？	錯！錯！大錯特錯！
否！否！斷じて否！	是統合人類步調的國家
人類の步調を揃へて行く國だ、	大型曳引機穿過農田
大きなトラクターが田畑を横ざり、	輕柔搖曳的金黃色浪潮正演奏著
やはらかにゆれる黄金色の波は「平和」の凱歌を奏でつゝ、	而在工業地，龐大的機械焦急盼望著「做工的人」。
そして工業地では尅大な機械が「働く人」を待ち焦れてゐる。	哪來的失業者！人手不足才對。
失業者所か！人手が足りないのだ。	那是明朗自由的國家。
それは明らかな自由な國だ。	我是知道它的存在的。
俺はその存在を知つてゐる。 ¹⁰²	

這首詩延續〈在山中遇見的人〉的失業主題，把視角拉高，開始綜觀整個社會乃至於整個世界的失業現象，描述資本主義體制所造成的災難，表達建立共產國家的理想。〈浪潮〉的敘述者不單只是控訴資本主義之惡（從「有罪的是誰！／我清楚地知道」可以看到在大檢舉之後趨於隱晦的指控，但對讀者來說答案早已不言自明），而是更進一步描繪出共產主義國家的理想藍圖。這首詩的結構明晰，以「有罪的是誰！／我清楚地知道」這一段作為分界，在其前段與後段分別描繪出了兩個世界，表現出「製造失業者洪水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vs「統合人類步調的國家」（共產主義國家）之間的對比。如此重視理念的陳述，已脫離了他早期的抒情詩路線。不僅緊貼著社會現實的狀況，也看到了對於改革社會、乃至於推翻既有國家體制的願景。此詩中的「金黃色浪潮」與上述《臺灣文學》中李彬〈我們啊，貧農〉一詩當中透過層層剝削才長成的「金黃浪潮」截然不同，

102 徐瓊二：〈波〉，《臺南新報》，1932年5月29日，6版。

是取代了「經濟恐慌的浪潮」、「罪惡的浪潮」的共產國家當中和平與勤勞的象徵。

一九三二年的徐淵琛在論述面也相當活躍。在《臺灣新民報》上發表的〈文學與社會生活——新民報應積極圖謀文學的振興〉（文學と社會生活——新民報は積極的に文學の振興を計れ）一文，提出了以下幾個重要論點：（一）殖民地臺灣的文學是不同於日本與中國的特殊存在；（二）藝術是社會生活的產物，文學必然具有政治的價值；（三）然而文學和政治是不同的領域，不能讓政治的興趣凌駕於文學之上。¹⁰³從上述這些論點，可以清楚看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在納普機關誌《戰旗》上所展開、以中野重治與藏原惟人為中心的「藝術大眾化論爭」的影響。例如第（二）、（三）點中，可以看到中野重治在等論爭中所提出的「藝術的價值是由其藝術對於進入人類生活的真實的深淺（生活的真實是離不開階級關係的）、以及其表現的素樸或繁雜程度來決定的」，¹⁰⁴以及「我們不論在任何場合都必須注意，不應把藝術上的規劃代換成政治上的規劃」¹⁰⁵等論點的再次強調。而第（一）點中更強調了殖民地臺灣的特殊性，可以看作是《臺灣文學》以來對於《無軌道時代》的方向的修正：作為殖民地人民，認為在臺灣誕生的普羅文學應該要更貼近殖民地。在這以後，徐淵琛還發表了〈失業者文學〉、〈關於臺灣普羅文學運動的方向——重大的大眾化問題〉（臺灣プロ文學運動の方向に就て——重大な大眾化問題）等文章，¹⁰⁶雖內容目前已不可得見，但單從標題便可得知他此時積極從事屬於臺灣的普羅文學的論述建構。劉捷在一九三三年將他定位為「弱冠的文學青年」，

103 徐瓊二：〈文學と社會生活——新民報は積極的に文學の振興を計れ〉，《臺灣新民報》，1932年4月26日。

104 中野重治：〈いはゆる藝術の大眾化論の誤りについて〉，收入平野謙、小田切秀雄、山本健吉編：《現代日本文学論争史》（東京：未來社，2006年9月），頁472。原出處：《戰旗》1928年6月號。

105 同前註，頁468。

106 劉捷：〈臺灣文學の鳥瞰〉，《臺灣文藝》創刊號（1934年11月），頁59-60。

並且是普羅理論家。從以前就參與文藝雜誌，相當具有戰鬥性」。¹⁰⁷從日後他的〈島都近代風景〉即可看到他對於此時普羅論述的實踐。¹⁰⁸

三、普羅詩的衰退

中文詩方面，延續著鄉土文學與臺灣話文論戰，一九三二年有《南音》創刊，開始了一連串臺灣話文詩的嘗試。然而這些詩已走向較為保守的右翼民族文學路線，不再有普羅詩中訴諸無產階級革命與共產主義理念的內容。這應可看作是一九三一年全島大檢舉以後，極左路線已再無發展餘地的緣故。事實上，上述《臺灣文學》以及徐淵琛的普羅詩，也已不再像《無軌道時代》和《赤道》那樣積極鼓吹階級鬥爭、透過自我檢閱的伏字流露出對體制的挑釁與衝撞。

可以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普羅詩在剛開始能夠融合「民族」與「階級」的觀點以符合殖民地臺灣的現實狀況，並且透過對於臺灣話文詩的重視而有機會進一步發展之時，便遭受無情的打壓。同時期的中國，一九三〇年代初普羅詩派因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壓迫，創造社和太陽社都被迫解散，也因其缺乏藝術性的搖旗吶喊不再受文壇青睞，故走向沒落。¹⁰⁹同樣的在日本，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以後軍國主義氛圍驟起，一九三二年日本普羅文化聯盟（克普）遭到大鎮壓，中野重治也在這波鎮壓中被逮捕入獄，日本普羅詩亦在此時式微。¹¹⁰

107 劉捷：〈一九三三年的臺灣文學界〉，《フォルモサ》第2期（1933年12月），頁34。

108 小說原文：徐瓊二：〈島都の近代風景〉，《第一線》（1935年1月）頁112-118。對於此篇小說的詳細分析以及該小說對於徐淵琛本身普羅文學理念的實踐，可參見星宏修著、朱虹譯：〈複數的島都／複數的近代性——以徐瓊二的〈島都的近代風景〉為中心〉，《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3期（2007年4月），頁177-196。

109 柯文溥：〈論“普羅詩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2期（1990年2月），頁59。

110 佐藤健一：〈プロレタリア詩〉，安藤元雄、大岡信、中村稔監修：《現代詩大事典》（東京：三省堂，2008年2月），頁586。

即使如此，普羅詩對帝國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的批判已確實進入臺灣詩人的視野。一九三四年，在東京與「克普」關係密切的臺灣藝術研究會回到臺灣，與原《臺灣文學》的臺灣人成員與原《南音》的成員合流，成立臺灣文藝聯盟與機關誌《臺灣文藝》。在民族與階級並進的思考下，遂有「左翼文化走廊」的中介者吳坤煌、¹¹¹「左翼詩學旗手」吳新榮¹¹²等詩人的出現。雖然此時的局勢已不可能容許過去嚴謹定義之下「作為階級鬥爭的武器」的普羅詩存在，但兩人的左翼詩創作基於對於前代中、日、臺普羅詩的理解之上展開，將普羅詩的精神繼續傳承下去。¹¹³

柒、結論

本文整理了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二年「普羅詩」在臺灣的發展過程。前期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年是臺灣對於日本的「普羅詩」與中國的「普羅詩派」的接受與移植的時期。後期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則是臺灣普羅詩走向突破但旋即衰退的時期。

首先，與左翼政治運動並無淵源的在臺日人藤原泉三郎與上清哉，在閱讀了日本普羅詩人中野重治的詩與詩論後成為其追隨者，於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開始發表朝向普羅詩的作品與論述。其次，藤原泉三郎與上清哉於一九二九年發行臺灣第一本具有普羅色彩的詩文雜誌《無軌道時代》，刊登在臺日人的日文普羅詩作品，展現出對於日本普羅詩的繼承與再創造。再者，與臺灣共產黨關係密切、刊有文藝作品的普羅雜誌《伍人報》、《明日》、《洪水報》、《赤道》、《現代生活》、《臺灣戰線》、《新臺灣戰線》等在一九三〇年陸續創刊，從現存的《洪水報》和《赤道》可以看到其轉載許多中國普羅詩派的作品。在上述的中日文普羅詩中，可以

111 參見柳書琴：〈左翼文化走廊與不轉向敘事：臺灣日語作家吳坤煌的詩歌與戲劇游擊〉，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年12月），頁163-200。

112 參見陳芳明：〈吳新榮：左翼詩學的旗手〉，《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臺北：麥田，1998年10月），頁171-198。

113 1934-1935年，吳新榮於《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吳坤煌則於《臺灣文藝》發表多首具有左翼精神的詩作，相當活躍。

看到最大的問題是，它們都如同直接將普羅詩由日本或中國移植過來一般，與殖民地臺灣的現實問題保持著距離，也與臺灣民眾的語言充滿隔閡。

一九三一年，在文協、民眾黨、共產黨都因全島大檢舉而被迫解散、文化界發生了鄉土文學與臺灣話文論戰之際，兩個新的案例為普羅詩迎來了正視現實的曙光：其一，為在臺日人與臺灣人聯合組織「臺灣文藝作家協會」、發行《臺灣文學》雜誌，在內容與語言上都更有意識地接近殖民地的現實。其二是從《無軌道時代》出道的唯一一位臺灣人徐淵琛發展出獨自的普羅詩與普羅文學論述，更站在殖民地臺灣的立場上來談論在臺灣誕生的文學。雖然當局對於左翼運動的鎮壓使極左路線的運動與作品失去繼續發展的空間，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普羅詩對於階級關係的思考、對殖民地臺灣特殊性的重視已經成為臺灣左翼詩人的共識。透過成員的連結以及文學運動系譜的建構，¹¹⁴《臺灣文學》的普羅詩精神遂得以在一九三四年臺灣文藝聯盟大集結時繼續被傳承下去。

114 成員的連結方面：原《臺灣文學》成員的徐瓊二、賴明弘、王詩琅、張維賢、廖毓文、朱點人等皆加入了「臺灣藝術聯盟」；而文學運動系譜的建構方面：楊行東的〈臺灣文藝界への待望〉（《フォルモサ》創刊號（1933年7月），頁16-22）以及楊達的〈臺灣の文學運動〉（《文學案內》第四號（1935年10月），頁66-67）兩篇文章皆將《臺灣文學》此份雜誌視為臺灣文學運動當中的一部份。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 〈「無軌道時代」の誕生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26日。
- 《臺灣大眾時報週刊 創刊號—第十號（復刻版）》（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8月）。
- 《臺灣文學》1卷2號（1931年10月）、1卷3號（1931年11月）、2卷1號（1932年2月）。
- 《赤道》創刊號（1930年10月31日）、第2號（1930年11月15日）、第3號（1930年11月30日）、第4號（1930年12月19日）、第5號（1931年1月17日）。
- 《洪水報》創刊號（1930年8月）。
- 《無軌道時代》創刊號（1929年9月）、第2號（1929年10月）、第3號（1929年11月）、第4號（1929年12月）。
- 《新臺灣大眾時報 創刊號-第二卷第四號（復刻版）》創刊號-第二卷第四號（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8月）。
- 復刻版《台灣出版警察報》（全六冊）（東京：不二出版，2001年2月）。

上田平清藏

- 1928 〈錦町たより 半鐘か 鳴ると火事か 起る話など〉，《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10日。

上清哉

- 1927 〈僕は見だ〉，《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1月26日。
- 1928a 〈第二次國民創作時代その他〉，《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2月24日。
- 1928b 〈錦町たより 芥川龍之介の事他亡斷想—〉，《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19日。
- 1928c 〈錦町たより〉，《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5日。
- 1930 《詩集 遠い海鳴りが聞えてくる》（臺北：南光書店，1930年2月）。

志馬陸平（中山侑）

- 1936 〈青年と臺灣＝文學運動の變遷＝〉，《臺灣時報》，1936年12月，頁108-114。

長崎洋吉

- 1929 〈那覇の波止場にて〉，《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月28日。

徐瓊二

- 1932a 〈山で會あつた人〉，《臺南新報》，1932年1月30日。
- 1932b 〈文學と社會生活——新民報は積極的に文學の振興を計れ〉，《臺灣新民報》，1932年4月26日。
- 1932c 〈波〉，《臺南新報》，1932年5月29日。
- 1935 〈島都の近代風景〉，《第一線》（1935年1月）頁112-118。
- 楊行東
- 1933 〈臺灣文藝界への待望〉（《フォルモサ》創刊號（1933年7月），頁16-22。
- 楊達
- 1935 〈臺灣の文學運動〉（《文學案内》第四號（1935年10月），頁66-67。
- 榑崎恭一郎
- 1928a 〈天才的新時代評論家 宮崎震作氏の頭の分析的批判〉，《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5日。
- 1928b 〈お斷り〉，《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12日。
- 1928c 〈問題の中心は何處にある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26日。
- 1929a 〈『夜明け前』其の他 藤村斷片（上）〉，《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2月4日。
- 1929b 〈『夜明け前』其の他 藤村斷片（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2月11日。
- 劉捷
- 1933 〈一九三三年の臺灣文學界〉，《フォルモサ》第2期（1933年12月），頁34。
- 1934 〈臺灣文學の鳥瞰〉，《臺灣文藝》創刊號（1934年11月），頁59-60。
- 榑崎恭一郎（筆者按：應為「榑崎恭一郎」之誤）
- 1928 〈露西亞文學斷片〉，《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17日。
- 藤原泉三郎、上清哉、宮尾進、谷口多津雄
- 1929 〈新しく詩の雜誌を發刊するについて〉，《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12日。
- 藤原泉三郎
- 1930 《陳忠少年の話》（臺北：文明堂書店，1930年11月；復刻：東京：ゆまに書房，2001年9月）。

近人文獻

「メカニック，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 (Wikipedia) 』」(來源：<https://ja.wikipedia.org/wiki/メカニック>，檢索時間：2021年8月10日)。

三浦建治 MIURA, Kenji

2018 〈明治・大正・昭和詩史(8)プロレタリア詩とは何か(3)〉，《詩人会議》第668期(2018年5月)，頁70-75。

“Meiji, Taishou, Shouwa Shishi (8) Puroretaria Shi Toha Nanika (3),” *Shijin Kaigi*, Vol. 668 (May, 2018), pp70-75.

中村稔、安藤元雄、大岡信監修 NAKAMURA, Minoru et al.

2008 《現代詩大事典》(東京：三省堂，2008年2月)。
Gendaishi Daijiten (Tokyo: Sanseidou, 2008).

中島利郎 NAKASHIMA, Toshirou

2005 《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小事典》(東京：緑蔭書房，2005年6月)。

Nihon Touchiki Taiwan Bungaku Shoujiten (Tokyo: Ryokuin Shobou, 2005).

中野重治 NAKANO, Shigeharu

1971 《藝術に関する走り書覚え書》(東京：白鳳社，1971年4月)。

Geijutsu ni Kansuru Hashirikakiteki Oboesho (Tokyo: Hakuhou Sha, 1971).

1978 《中野重治詩集》(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12月)。

Nakano Shigeharu Shishuu (Tokyo: Iwanami Shoten, 1978).

2006 〈いはゆる藝術の大衆化論の誤りについて〉，收入平野謙、小田切秀雄、山本健吉編：《現代日本文学論争史》(2006年9月，東京：未來社)，頁465-472。

“Ihayuru Geijutsu no Taishuukaron no Ayamari Nitsuite,” in Hirano Ken, Odagiri Hideo, Yamamoto Kenkichi (eds.), *Gendai Nihon Bungaku Ronsoushi* (Tokyo: Mirai Sha, 2006), pp.465-472.

王一剛 (王詩琅) WANG, Shih-lang

1954 〈思想鼎立時期的雜誌〉，《臺北文物》第3卷第3期(1954年12月)，頁131-133。

“Sixiang Dingli Shiqi de Zazhi,” *Taipei Wenwu*, Vol. 3, No. 3 (December, 1954), pp.131-13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乃信等譯 *Taiwan Zongdufu Jingwuju* (ed.)

- 1989 《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一冊・文化運動（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中譯版〕）》（臺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6月）。
Taiwan Zongdufu Jingchayangezhi (Taipei: Chuangzao Chubanshe, 1989).
- 皮述民、邱燮友、馬森、楊昌年 Pi, Shu-min et al.
1997 《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駱駝出版社，1997年8月）。
Ershishiji Zhongguo Xinwenxueshi (Taipei: Luotuo Chubanshe, 1997).
- 吳克泰 WU, Ke-tai
2002 《吳克泰回憶錄》（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8月）。
Wu Ke-tai Huiyilu (Taipei: Renjian Chubanshe, 2002).
- 吳叡人 WU, Rwei-ren
2001 〈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2001年4月），頁76-93。
“Taiwan Feishi Taiwanren de Taiwan Buke: Fanzhimin Douzheng yu Taiwanren Minzu Quojia de Lunshu 1919-1931,” in Lin Chia-lung, Cheng Yung-nien (eds.), *Minzu Zhuyi yu Liangan Quanxi* (Taipei: Xin Ziran Zhuyi, 2001), pp.76-93.
- 2006 〈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卷2期（2006年6月），頁127-218。
“Fuermosha Yishixingtai: Shilun Riben Zhimin Tongzhi Xia Taiwan Minzu Yundong ‘Minzu Wenhua’ Lunshu de Xingcheng (1919-1937),” *Xin Shixue*, Vol. 17, No. 2 (June, 2006), pp.127-218.
- 林淑美 LIN, ShukuBi
1998 〈プロレタリア詩〉，和田博文編：《近現代詩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年4月），頁181-196。
“Puroretaria Shi,” in Wada Hiroshi (ed.), *Kingendai Shi wo Manabu Hito no Tameni* (Kyoto: Sekai Shisou Sha, 1998), pp.181-196.
- 2005 《昭和イデオロギー 思想としての文学》（東京：平凡社，2005年8月）。
Shouwa Ideorogi: Shisou toshi te no Bungaku (Tokyo: Heibon Sha, 2005).
- 林靜雯採訪、整稿 LIN, Ching-wen
2017 〈穿越「白色恐怖」的歲月——受難者家屬徐守綱先生口述歷史〉，《臺灣風物》，67卷1期（2017年3月），頁99-146。

“Chuan Yue ‘Baise Kongbu’ de Suiyue: Shounanzhe Jiashu Hsu Shou-kang Xiansheng Koushu Lishi,” *Taiwan Fengwu*, Vol. 67, No. 1 (March, 2017), pp.99-146.

河原功 KAWAHARA, Isao

2001 〈陳忠少年的話 解題〉，藤原泉三郎：《陳忠少年的話》（東京：ゆまに書房，2001年9月），頁1-7。

Kawahara Isao, “Chin Chuu Shounen no Hanashi Kaidai,” in Fujiwara Sensaburo, *Chin Chuu Shounen no Hanashi* (Tokyo: Yumani Shobou, 2001), pp.1-7.

2003 〈上忠司と黒木謳子〉，河原功編：《台灣詩集》（東京：綠蔭書房，2003年4月），頁599-612。

“Kami Tadashi to Kuroki Oushi,” in Kawahara Isao (ed.), *Taiwan Shishuu* (Tokyo: Ryokuin Shobou, 2004), pp.599-612.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 KAWAHARA, Isao

2004 《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臺北：全華，2004年3月）。

Taiwan Xinwenxue Yundong de Zhankai: Yu Riben Wenxue de Jiedian (Taipei: Quanhua, 2004).

近藤健一郎 KONDOU, Kenichirou

2006 《近代沖繩における教育と国民統合》（北海道：北海道大学，2006年2月）。

Kindai Okinawa niokeru Kyouiku to Kokumintougou (Hokkaidou: Hokkaidou Daigaku, 2006).

星名宏修著，朱虹譯 HOSHINA, Hironobu

2007 〈複數的島都／複數的近代性——以徐瓊二的〈島都的近代風景〉為中心〉，《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3期（2007年4月），頁177-196。

“Fushu de Daodou/Fushu de Jindaixing: Yi Hsu Chiung-erh de ‘Daodou de Jindai Fengjing’ Wei Zhongxin,” *Taiwan Wenxue yu Kuawenhua Liudong: Dongya Xiandai Zhongwen Wenxue Guoji Xuebao*, Vol. 3 (April, 2007), pp.177-196.

柯文溥 KE, Wenpu

1990 〈論“普羅詩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2期（1990年2月），頁48-61。

“Lun ‘Puluo Shipai’,”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Yanjiu Congkan*, Vol. 1992, No. 2 (February, 1990), pp.48-61.

柳書琴 LIU, Shu-chin

2015 〈左翼文化走廊與不轉向敘事：臺灣日語作家吳坤煌的詩歌與戲劇游擊〉，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

- 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年12月），頁163-200。
- “Zuoyi Wenhua Zoulang yu Bu Zhuanxiang Xushi: Taiwan Riyu Zuoia Wu Kun-huang de Shige yu Xiju Youji,” in Li Cheng-chi, Li Yu-lin (eds.), *“Diguo” Zai Taiwan: Zhimindi Taiwan de Shikong, Zhishi yu Qinggan* (Taipei: Taida Chuban Zhongxin, 2015), pp.163-200.
- 柳書琴主編 LIU, Shu-chin (ed.)
- 2019 《日治時期臺灣現代文學辭典》（臺北：聯經，2019年6月）。*Rizhi Shiqi Taiwan Xiandai Wenxue Cidian* (Taipei: Lianjing, 2019).
- 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 WAKABAYASHI, Masahiro
- 2007 《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2007年3月）。*Taiwan Kangri Yundongshi Yanjiu* (Taipei: Bozhongzh, 2007).
- 飛鳥井雅道 ASUKAI, Masamichi
- 1982 《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史論》（東京：八木書店，1982年11月）。
- Nihon Puroretaria Bungaku Shiron* (Tokyo: Yagi Shoten, 1982).
- 栗原幸夫 KURIHARA, Yukio
- 2004 《増補新版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とその時代》（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04年1月）。
- Zouhoshimban Puroretaria to Sonojidai* (Tokyo: Impakuto Shuppankai, 2004).
- 現代詩誌総覧編集委員会編 Gendaishi Shishi Souran Henshuuikankai (ed.)
- 1996 《現代詩誌総覧 (1) 前衛芸術のコスモロジー》（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96年7月）。
- Gendaishi Shishi Souran (1) Zenei Geijutsu no Kosumoroji* (Tokyo: Nijigai Asoshietsu, 1996).
- 許俊雅 HSU, Chun-ya
- 2012 〈《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臺灣文壇〉，《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4期（2012年4月），頁169-218。
- “Hongshui Bao, Chidao Dui Zhongguo Wenxue Zuopin de Zhuanzai: Jianlun Chuangzao She Zai Rizhi Taiwan Wentan,” *Taiwan Wenxue Yanjiu Xuebao*, Vol. 14 (April, 2012), pp.169-218.
- 許峰源 HSU, Feng-yuan
- 2019 〈阿根納造船廠的歷史風華〉，《檔案樂活情報》第147期（2019年9月16日）。來源：
<https://www.archives.gov.tw/ALohas/ALohasColumn.aspx?c=1980>
，檢索時間：2021年4月10日）

陳芳明 CHEN, Fang-ming

1998 《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臺北：麥田，1998年10月）。

Zuoyi Taiwan: Zhimindi Wenxue Yundong Shilun (Taipei: Maitian, 1998).

舒蘭 SHU, Lan

1998 《中國新詩史話（二）》（臺北：渤海堂文化，1998年10月）。

Zhongguo Xinshi Shihua (2) (Taipei: Bohaitang Wenhua, 1998).

華崗 HUA, Gang

1982 《中國大革命史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5月）。

Zhongguo Dageming Shi 1925-1927 (Beijing: Wenshi Ziliao Chubanshe, 1982).

橫路啟子 YOKOJI, Keiko

2011 〈藤原泉三郎とその台湾時代--文学活動を中心に〉，《天理臺灣學報》20期（2011.7），頁27-40。

“Fujiwara Sensaburo to Sono Taiwan Jidai: Bungaku Katsudou wo Chuushin ni,” *Tenri Taiwan Gakuhou*, Vol. 20 (July, 2011), pp.27-40.

2012 〈在台内地人のプロレタリア文学：1920年代末の藤原泉三郎の諸作品を中心に〉，《天理臺灣學報》21期（2012.6），頁13-24。

“Zidai Naichijin no Puroretaria Bungaku: 1920 Nendai Matsu no Fujiwara Sensaburo no Sho Sakuhin wo Chuushin ni,” *Tenri Taiwan Gakuhou*, Vol. 21 (June, 2012), pp.13-24.

2015 〈論臺灣地區日本人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中的共同體意識變化問題——以藤原泉三郎為中心〉，《東北亞外語研究號》2卷3期（2015.6），頁34-40。

“Lun Taiwan Diqu Ribenren Wuchan Jieji Wenxue Yundong Zhong de Gongtongti Yishi Bianhua Wenti: Yi Fujiwara Sensaburo Wei Zhongxin,” *Dongbeiya Waiyu Yanjiu Hao*, Vol. 2, No. 3 (June, 2015), pp.34-40.

澤正宏 SAWA, Masahiro

1993 〈第三章 プロレタリア詩 概観〉，澤正宏、和田博文編：

《作品で読む現代詩史》（京都：白地社，1993年3月），頁65-67。

“Chapter 3: Puroretaria Shi Gaikan,” in Sawa Masahiro, Wada Hiroshi (eds.), *Sakuhin de Yo mu Gendaishi Shi* (Kyoto: Hakuji Sha, 1993), pp.65-67.

龍泉明 LONG, Quanming

1997 〈普羅詩派詩歌創作得失論〉，《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31 期（1997 年 7 月），頁 73-80。

“Puluo Shipai Shige Chuangzuo Deshi Lun,” Wuh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Vol. 231 (July, 1997), pp.73-80.